

反映时代精神是文艺创作的神圣使命

□刘金祥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艺作为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引导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人文风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文艺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这既是对文艺创作价值取向的深刻阐发，也是对作家艺术家履行尽责寄予的殷切希望。

反映时代精神是文艺创作的重要价值取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文艺都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这表明作家艺术家不仅是时代变迁演进的亲历者、见证者和抒写者，更是时代精神的擢拔者、时代风气的彪炳者、时代风尚的垂范者。当今中国，正处在大踏步赶上现代化潮流并站在世界发展前列的历史时期，正处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要贡献的伟大时代，忠实记录、深刻反映、艺术再现这个恢弘时代的巨大变迁，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既是文艺创作的中心任务，也是当代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价值取向。文艺社会学原理表明，时代精神作为时代的脉搏、时代的灵魂、时代的旗帜，代表着文艺创作的核心、动力与趋向。要确保文艺创作始终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就必须大力倡导和积极弘扬时代精神，这不仅是文艺创作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文艺创作的本质特征。

每个时代孕育着每个时代的精神，每种时代精神表征着当代人最崇高的价值追求。我国近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培植铸塑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一时代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蕴含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价值理念，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旋律和最强音，成为当下国人的重要价值追求。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观念集成，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作家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时代精神在创作实践中的淬炼、投射、聚合和涵育，诚如英国作家劳伦斯所说：“艺术家的职责，是揭示在一个生气洋溢的时刻，人与周围世界之间的关系。由于人类总是在种种旧关系的罗网里挣扎，所以艺术总是跑在时代前头。”近年来，我国作家艺术家积极投身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倾情服务人民群众，倾心创作精品力作，热情讴歌全国各族人民寻梦追梦圆梦的奋斗历程，奏响了时代之声、爱国之声、人民之声，开启了我国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崭新气象，发挥了“文艺是时代前进号角”的特殊效能。但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文艺创作尽管作品种类比此前各个时期繁多丰盈，但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趋增长的高层面高品质的精神需要和审美需求。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当今时代是中国人追求理想实现梦想最生动勃发的时代，也是文艺工作者最意气风发的时代。只有把握时代发展的脉动与契机，展现人民群众在民族复兴伟业中的创造精神，将炙热的生活变成滚烫的文字，文艺才能在描绘时代图景中放大自身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所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作家艺术家要主动鼓荡和自觉追求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努力捍卫和切实恪守文艺创作的正确

价值取向，进一步承负和履行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与责任担当，以饱含激情与饱满诗意的笔触，精准有力地描绘当今天大变革时代背景下的生活主潮与社会景观，创作出文质俱佳的优秀作品，把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奉献给伟大的人民和伟大的时代。

反映时代精神是文艺创作经典化的重要路径

作为社会生活与社会变革的观念浓缩和意识升华的时代精神，是在现实经济基础上所整合聚变的上层建筑，是对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典型化认知和理性化表达，所以，时代精神不仅是社会生活嬗变的人文结晶，更是表征社会生活本质的经典文艺作品的文化母体。“歌谣文理，与世推移”，可以说，时代精神一方面是滋养文艺作品的文化温床，另一方面也是提升作品精神境界、催生经典品格的重要路径，文艺创作只有高扬时代精神的旗帜，镂刻时代足迹，鸣响时代回音，镌绘时代图谱，才能构织出具有深湛意蕴的经典作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所指出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我们知道，经典文艺作品蕴藉着人们的情感和梦想，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思想深度、文化厚度和精神高度，在纾困心理、慰藉心灵、淳化心绪和提升心智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穿越时空、传承后世的经典文艺作品，虽然不是历史学文本和社会学专著，但却承载着不同时代的世道人心，浓缩着不同时代的社会面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指出：每一部包涵时代精神的文艺作品，都无异于“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并由它们构筑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高地与信仰圣域。文艺经典作为经过时代涵寓、历史淘漉和社会磨砺所形成的鸿篇嘉构，揭示了时代发展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潜藏着强大思想力量和丰厚精神釉质，不仅启发着哲人的心智和灵感，而且陶冶着大众的情性和德操。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关于经典文艺作品特质与功能有着精辟阐述与科学论断，“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

时代精神本身虽然明朗清晰，但其表现形式却如同汪洋大海的波涛般变化不居、气象万千。图解时代精神、肢解时代精神固不足取，而游离时代、规避时代无疑是经典作品创作的歧途甚至绝路。当代中国，各种思想相互激荡各种文化相互交融，社会生活目迷五色社会结构日趋多元，特别是市场经济在深刻改变和重新塑造社会生活、经济形态以及人们思想情操和价值取向的同时，也在极大调整和不断修饰着文艺的形态和质感，其结果便是引发文艺创作在思想倾向、美学品位、艺术形式、创作方法和价值追求上的多种选择。在文艺创作机制和社会功能中，假如欲望化取代了社会性、娱乐化屏蔽了义理性、利益化淹没了功德性、恣意化支配了规约性、附庸化替代了先导性、低俗化消解了崇高性，那么文艺创作必然会在丧失本体价值的同时也丢掉了其本应具有的社会意义与审美功能，其最终结果，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断言的那样，文艺产品及其创作者们一旦将高筑于民族利益和人民立场之上的崇高、正义、公理、奉献等观念、情感和追求“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的时候，就必然会在形态、性质和功能上异化为精神的疣物，其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畸变与消解就会在所难免。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他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作家艺术家只有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地用博大胸怀去拥抱时代、用深邃目光去观察时代、用真挚感情去体验时代，始终不渝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审美去创作既属于这个特殊

时代、又呈现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的精品力作，才能不断推出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传世经典，才能无愧于时代赋予的庄严而神圣的使命。

反映时代精神是文艺工作者德艺修为的重要表征

作为国家软实力和民族文化风貌集中体现的时代精神，是以人为主体的特定的时代生活与社会实践的升华物，其深刻反映了传统文化和特定时代所形成的集体意识、大众心理和价值追求，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所秉持的主流意识，成为作家艺术家所膜拜的核心理念。因此，要使作为铸造灵魂工程的文艺创作始终充盈时代精神，就必须提升创作主体的综合素养，笃化作家艺术家的德艺修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再次提出：“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努力做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除了要有好的专业素养之外，还要有高尚的人格修为，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这就要求作家艺术家努力做到德艺双馨，既要成为否弃不良时代风气的践行者，又要成为践行良好时代风尚的引领者。一是树立科学的时代观。作家艺术家书写描摹时代必须坚持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把握现实生活的基本面和基本走向，分清时代发展的主脉与支流，厘定社会递嬗的表象与本质，正确处理褒扬礼赞与批判鞭挞的关系，积极创作作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时代聚精神、为自身留清名的优秀作品，努力释放文艺作品的积极功效和正向能量。二是把时代精神融入作品。作家艺术家要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统摄文艺创作，不断创作出体现时代精神、彰显时代风貌、切入时代腹地、反映时代本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妙作佳构，用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烛照生活，以人文组带牵系人与人的心灵之约，摹绘传统文化神韵，展现时代精神风采，增强人们的生活信心和生存勇气，提升人们的民族骨气和文化底气。三是发扬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要求文艺工作者要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现实主义既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也是一种文艺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倡导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人民，主张作家艺术家深入现实生活，汲取时代养分，坚持问题导向，表现大众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

时代精神本身虽然明朗清晰，但其表现形式却如同汪洋大海的波涛般变化不居、气象万千。图解时代精神、肢解时代精神固不足取，而游离时代、规避时代无疑是经典作品创作的歧途甚至绝路。当代中国，各种思想相互激荡各种文化相互交融，社会生活目迷五色社会结构日趋多元，特别是市场经济在深刻改变和重新塑造社会生活、经济形态以及人们思想情操和价值取向的同时，也在极大调整和不断修饰着文艺的形态和质感，其结果便是引发文艺创作在思想倾向、美学品位、艺术形式、创作方法和价值追求上的多种选择。在文艺创作机制和社会功能中，假如欲望化取代了社会性、娱乐化屏蔽了义理性、利益化淹没了功德性、恣意化支配了规约性、附庸化替代了先导性、低俗化消解了崇高性，那么文艺创作必然会在丧失本体价值的同时也丢掉了其本应具有的社会意义与审美功能，其最终结果，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断言的那样，文艺产品及其创作者们一旦将高筑于民族利益和人民立场之上的崇高、正义、公理、奉献等观念、情感和追求“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的时候，就必然会在形态、性质和功能上异化为精神的疣物，其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畸变与消解就会在所难免。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他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作家艺术家只有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地用博大胸怀去拥抱时代、用深邃目光去观察时代、用真挚感情去体验时代，始终不渝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审美去创作既属于这个特殊

2016年10月29日，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福建省作家协会、福建省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共龙岩市委宣传部、中共连城县县委县政府在福建省连城县主办了“文化诗学与童庆炳先生学术思想研讨”。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位学者与会，会议围绕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童庆炳文化诗学的理论与创新、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作为中国文艺理论界的领军人物，童庆炳先生一直奋斗在文艺理论研究和教学的第一线，他提出的“文化诗学”构想将陷入理论困境的文学研究方法具体化为可操作性的理论命题，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点呼吁”“三个维度，三种品格，一种追求”“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等等，为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建设作出了努力。同时，童庆炳先生也身体力行，积极投身文学创作，曾写作两部长篇小说和多部散文集，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童庆炳先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程正民教授认为，文化诗学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体现了一种有人文情怀的文艺学，一种有科学理性精神的文艺学。文艺学研究是复杂的，不能靠单一方法、一种灵丹妙药来解决，而是要通过文化诗学理论去探索各种方法之间的关系，完成内容与形式、文本结构与历史语境的互动互构。他高度评价了童庆炳文化诗学蕴含的“和而不同”的整合性，对与会学者深有启发。

冯毓云教授着重阐释了文化诗学的“现实性”，并评价这一理论体系立足中国，建构了文艺理论的“中国式话语”。冯教授认为，童庆炳先生文化诗学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归根到底都是要求强化文学理论研究的现实品格：“一个中心”是从文学独特的审美特征出发，强调文学理论须臾不能离开文学的现实；“两个基本点”从人类文化这个大视野出发，强调文学理论研究必须从历史语境出发，既要审时度势地考察与文学和文学理论有关的一切历史条件、历史思潮、历史诉求和历史局限性，又要高屋建瓴地分析、综合、创新。

马大康教授将童庆炳先生的“文学活动说”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要更为细致地把握和考察“文学行为”，将文学视为一种独特的话语行为，通过对话语行为和人之行为展开分析来揭示话语和人物的历史性，由此推进文学诗学建设。

文学诗学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学者们就如何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如何就审美问题展开跨文化对话，完成中国当代文学建设的艺术更新等话题展开了讨论。

沈金耀教授从中国传统思想的角度对文化诗学的内涵做出了阐释，认为文化诗学的“文化”强调的是其动词意涵，也就是人的自我塑造，倡导的是一种诗性的文化创意。沈教授从儒家“兴于诗”、“性本善”的观点出发，试图从文化的整体意义来把握人生存的可能性，打通传统思想与现代诗学的关系，从而对人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发展这一“文化创意”问题做出思考。

香港大学的张本楠教授运用文化诗学的方法，结合20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语境，对王国维戏曲研究中之“重文章而轻音律”“考显而史隐”“扬元剧而抑明清曲”这三个争议性论题做出了回顾与分析，深入探讨了王国维对中国戏曲研究走向现代的贡献、历史地位以及王国维的内心世界。

方锡球教授说，不同于传统的“龙学”研究范式，以童庆炳先生为代表的“现代阐释范式”研究展现了宏观的理论视野、个性化的学术积淀和个人性的理论取向，其所建构的“传统——诠释——新变”双重阐释模式是对文化诗学方法的自觉运用，标志着《文心雕龙》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姚爱斌教授认为，童庆炳先生多年倡导的文化诗学，强调多种研究方法的整合与统一，经过众多文学理论研究者的努力和实践，文化诗学已经化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治学理念，渗透于广大学人的学术研究之中。

童庆炳先生不仅是文艺理论家，同时还是一名作家。在童先生看来，理论研究与文学创作共同产生了意义，都是发自同一个普遍的时代精神，都是对于时代的认识，二者所创造的世界同样重要。

裴亚莉教授深入历史语境，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评析了童庆炳先生的散文创作。裴教授认为，童庆炳的散文创作是学院散文写作的代表，既有非常可靠的学理支持，又能体现出生动鲜活的文学性特征，并且由于个人际遇，其散文写作渗透着丰富的社会主义经验，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在童庆炳散文中，对新中国经验的描写与对新时期各种文化思潮的反思实现了历史交汇，从这个意义上讲，童庆炳的散文不仅仅是对小我人生经验的书写，而且是对于民族历史及未来的深刻思考。

赵勇教授聚焦于童庆炳先生的“故乡散文系列”，并将其中反复吟哦的乡愁、怀旧主题与童先生晚年提出的“物以情观”的美学思想联系起来思考，指出童庆炳的故乡散文完成的是一种学术层面的还乡之旅，并且在这种文学还乡的形式和审美型怀旧中得出了“审美即‘物以情观’”的著名美学论断，文学、经验和理论在此融为一体。

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展开跨文化对话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赵宪章教授从学理层面梳理了文学图像论由初具规模到发展成新世纪显学的生长过程，并尝试对文学、图像联姻的必然性作出解释。他提出，如果说19世纪人类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社会问题，彼时的文学研究母题是“文学与社会”；而进入20世纪后，意识形态上的表意矛盾在人类社会突显，使得文学研究的母题相应地演变为“文学与语言”；那么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21世纪，图像取代语言来进行表意的趋势已经初露端倪，文学研究极有可能演变为“文学与图像”母题。

傅修延教授聚焦于中国传统文学诉诸听觉的叙述方式，以麦克卢汉所说的“听觉人”与“视觉人”来比较中西方文学的不同叙事传统。他将听觉传统作用下中国古代的叙事特征概括为“尚简”“贵无”“趋晦”和“从散”，并对明清小说的“缀段性”结构与西方小说“头身尾”一以贯之的整体性做出了细致的考察和对照，详尽地论述了西方视觉叙述传统与中国听觉叙述传统的差异。

作为教育家与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有着非常丰富的教育思想，本次大会分组专门予以研讨。《教师月刊》主编林茶居、《文学评论》编审吴子林介绍了《教育，整个生命的投入——童庆炳教育思想文萃》的编选、出版过程，深入分析了童庆炳先生语文教育改革的新思维及其意义所在，并与连城县20余位中学语文骨干教师积极互动，探讨了未来中学教育可能的发展路径。

李春青教授在会议总结中指出，文化诗学作为文化理论研究的一项突破性尝试，是大有可为的，本次会议对文化诗学三十年的回顾和展望，表明文艺理论研究者已经逐渐摆脱研究困境和影响焦虑的纠缠，开始一同沿着文化诗学的路向展开各自的学术突围：

一方面，我们需要在童庆炳先生的基础上去丰富、细化和发展诗学诗学，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在研究实践中去践行文化诗学，使其变为活生生的、具体可感的研究实践，把文化诗学真正落到实处、落到细处，让文化诗学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筚路蓝缕，薪火相传：文化诗学三十年

——《文化诗学与童庆炳先生学术思想研讨》综述

□田原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篇篇好看，期期精彩！

北京文学 精彩阅读·2017年第一期要目

作家人气榜

花满月(中篇小说) 方方

反讽之刃与幽昧事象(评论) 李建军

现实中 国

山城不可见的故事(报告文学) 李燕燕

好看小说

那年打仗(中篇小说) 张廷竹

靡常(中篇小说) 陈斌先

活期存款(短篇小说) 孙青瑜

五子棋(短篇小说) 张玉清

我们都爱短故事(小小说六篇)

(香港)周洁茹

新人自荐

把兄弟(短篇小说) 王克斌

费明

见字如见面(点评) 张哲

敬告读者:本刊每期内文160页,部分彩

色印刷,装帧精美,每册定价10.00元,全年12期定价120.00元。2017年报刊仍在征订,读者可到当地邮局或杂志铺(<http://www.zhipu.com>)订阅本刊,也可到当地报刊亭或在北京文学微店购买本刊;或汇款到我社发行部邮购,我社将免邮寄费。本刊国内邮发代号:2-85,国外邮发代号:M428;地址:100031,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发行部;电话:010-66031108,66076061

天下中文

哀哉,植物人!(散文) 杨文丰

四季物语(散文) 冷冰

范文程(散文) 王彬

真情写作

杨炼的诗(组诗) 杨炼

瑞雪丰年(散文) 任林举

岁末留香(散文) 李成琳

假如我是那天空飞舞的雪花(组诗) 无语丁香

北漂故事征文精选

北漂的日子最精彩

“北京,我的太阳!” 梁士霞

毛银鹏

麦子

北京文学月刊社

店

长按二维码扫描进入店铺

店

店

店